

钩 沉

——来自工厂的记忆

编者按

揭开尘封的记忆,你可以听到矿山里汽笛的鸣响,工人们三三两两步入工区开始一天的生产;你可以看到热气腾腾的茶炉房,饭菜的香味四处弥散;你可以感受到参与“节俭光荣”活动的自豪,以及听喇叭学技术的热忱。

他们,是再平凡不过的一线工人。他们所经历的,是平淡无奇的一段时光。而回味留存在他们记忆中的或清晰或散淡的痕迹,仿佛可以看见他们走过的路,吃过的苦,挥洒过的汗水,燃烧过的青春。

聆听岁月的足音,那是世间最动听的回响。

每天立在矿福利楼上的汽笛准时响起近10次,笛声响彻云霄,提醒着上三班的矿工起床、吃饭、上班

远逝的矿山汽笛声

一块“上海”牌手表价格是125元,而一位普通四级采煤工的月工资是17.5元。当时,人们谈对象时提出的条件是“三转一响”(即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收音机),可见手表的地位。

在乡村,农民出工靠队长的哨音或敲钟声;而在煤矿,不知是谁发明了用汽笛报时的方法,解决了按时作息这一难题。立在矿福利楼上的汽笛每天准时响起近10次,笛声响彻云霄,提醒着上三班的矿工起床、吃饭、上班。汽笛声每次鸣响约两分钟,其报时作用可以惠及矿山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。

汽笛声年复一年地响着,虽然对中夜班、尤其是夜班职工休息造成影响,但别无

他法,工人们也都习惯了。

没有钟表的日子总有诸多不便。比如去市里办事,没掌握时间,往往会错过机关上班时间。更大的不便在井下作业时凸现,有时整个掌心面仅一人有手表,工友们会要求他每到整点报一下,工友们口口相传,以便把握时间。

最苦的是我父亲,他在全井下最偏远的地方独自一人看岗,又无人进行交接班。因无法掌握时间,他比别人晚上井两三个小时,这是常有的事。经常是当他上井后,工友们都已吃完饭休息了。

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,父亲所在的工区分有两张“手表票”,炙手可热。父亲因忍

受不了时常晚上井的苦楚和无奈,想尽办法要来了一张票,买到了一块“金鹿”牌怀表。这块55元的怀表成为我们家最大的资产,也是我父亲的“命根子”,一直陪伴他近20年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参加了工作,当时手表仍是紧俏物资,矿工们仍旧以汽笛声来提示作息时间。直到1987年,父亲才多方托关系,为我买了一块“苏州”表,我也成了照相要挽起袖子露出表的“有表一族”,那块表让我幸福和自豪了好几年。

曾几何时,矿山的汽笛声已不再响起,连手表都被手机取代了,但那响亮的汽笛声,会长久地在老一辈工人耳中回响。



“铁锹彪”

张继涛 冯汝深

原淄博矿务局洪山煤矿一立井机厂职工栾福彪,经常对悬挂在镜框里那张上个世纪70年代的黑白老照片沉思。

那是1978年的秋天,栾福彪(右一)和工友们在废料场拣选出可用的物料,让它们重新“上岗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,工友们热火朝天地开展“节俭光荣”活动。由于生产成本紧张,无论是生产一线职工还是地面辅助工人,都会将剩余的材料或可利用的物料,马上放到工具包里,升井后交机厂。哪怕是10厘米的铁丝也要像宝贝一样,赶紧捡起来。

当时,栾福彪的主要工作是对电动机、运煤溜子、照明设备进行维修,同时还要把回收来的废旧物料加工制作成铁锹和手镐等生产工具,他最拿手就是制作铁锹。

他将杨树杆锯成一根根锹柄,再用刨刀进行细加工,将废旧的铁板用气割成铁锹头,再用砂轮机细磨成铁锹模样,然后锹柄灌装入铁锹头的支撑筒中。一天下来,栾福彪可以制作7把铁锹,结实又耐用,后来工友称他为“铁锹彪”。

栾福彪回忆道:“每当井下职工们升井后,俺们机厂就像赶集一样,可热闹了!”据他介绍,每当职工们满怀喜悦地拿着自己回收来的铁管、铁板、三角铁等废旧物料到机厂废料场上交时,每个人都觉得挺自豪。

作为废料统计员的栾福彪从早忙到晚,一个人整理、分类、归架,虽然身体有点吃不消,但干得格外带劲。

37年过去,这张老照片依然不时地把栾福彪带回那个火热的年代。



一到冬季,建厂时为锅炉房盖的专用烟筒每天要吃掉好几火车皮的煤,烟灰渣遍地。如今,“冒黑烟、扬尘渣”的烟筒已成历史

黑烟白烟



张洪义

雪后初晴,踏上上班必经的春阳路,朝阳下,抬头北望,公司那座75米高的烟筒甚是醒目,银色的世界,天空湛蓝,云朵洁白,绿底烟筒红白相间,烟筒上方,一条镶着晨曦光辉的浓浓的白色烟带,在童话般的画面里翻滚舞动。我的思绪随烟而舞,飞上蓝天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冬日,我穿着还未褪色的军装,兴奋地走进公司大门,走进了上世纪50年代“铁道部八面红旗之一”的机械车间闷车班。刚入厂的新鲜劲,让我到处乱钻,转到车间北门时,我发现脚下积雪铺着一层黑色灰渣,东张西望间,总有什么东西往脸上落,我忍不住扬起手一个劲儿地划拉。四下望去,动力车间锅炉工段的红砖烟筒顶上,黑烟滚滚,正寻思间,不知什么东西掉进了眼睛里。“那是烟灰渣,没看见头顶上冒着黑黑的浓烟吗?”师傅告诉我,这是建厂时为满足日常生产和职工生活用热,为锅炉房盖的专用烟筒,一到冬季,它每天要吃掉好几火车皮的煤,烟灰渣年年这样多。

从此,再经过那个大烟筒附近,我总是深深地埋着头。1996年,机械车间扩建成了转向架制造中心,动力车间变成了动力厂,我所在的闷车班,也升级为配件车间,因车间北大门与动力厂对门为邻,那个红砖大烟筒,变得与我近在咫尺。一

进冬日,车间厂房的北外墙就会落下小米粒大的烟渣,足有半尺厚。为避免天空中漂浮着的灰渣落入眼中,我只想尽量离它远远的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后来,我所在的车间搬到了公司东边的新厂房,离那个叫人烦心的大烟筒远了许多,对它的记忆也开始渐渐淡去。但冬日偶尔路过,我还会深深地低着头,用眼角余光瞄上一瞄—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它身上被套上了一圈圈铁箍;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这个红砖大烟筒已被一个新建的浅绿色烟筒所取代;再过一段时间,浅绿色烟筒的顶部,又披上了红白相间的外衣。

直到2012年冬的一个清晨,我上班经过南北向的春阳路,无意中望见,那红白相间的烟筒里冒出的烟,竟然和蓝天中的云朵一样白!我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,欣赏着缕缕白烟在变幻滚动间创造出的各种奇异造型,记忆不禁从脑海深处蔓延、生长出来——这是曾经屡屡迷我眼睛的烟筒吗?我索性直奔那个大烟筒而去。

原来,为实现“森林工厂”、“花园工厂”的发展思路,从2008年起,公司下大力气针对产生环境污染的根源开展了系列专项攻关,“消烟除尘”作为其中一个重点项目,直指锅炉烟筒顶上那条猖獗的“黑烟龙”。经过多年连续投入巨资进行深度改造,厂内原有的6座15T老式烧煤锅炉,全都陆续被更新成环保型设备,除尘、除硫效果分别达到了96%和99%。“冒黑烟、扬尘渣”的烟筒,就这样成为历史。(作者系中国中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)

条件差的,就只带一大盒饭,饭里埋着两块臭豆腐,当时臭豆腐1分一块,一吃吃上几个月,把班组里的其他工人熏得远远的

饭 盒

本报记者 刘旭

“我再找找,好久不用了,但肯定能找到。”12月14日,在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老职工、60岁的张景振家中,他弓着背,将旧物一件一件搬出,翻找着铝饭盒。终于,在角落深处,找到了一大一小两个落满灰尘的饭盒,饭盒边角线因磕碰而歪歪扭扭,盒盖表面坑坑洼洼,正中央的“东方红”三个大字依稀可辨。

用抹布抹去铝饭盒上的灰尘,张景振的思绪也随之回到了30年前,那个上班族带着铝饭盒到茶炉房热饭的年代。

1980年,26岁的张景振刚入厂。那时的工人,上班都是拎着布兜或者把叫做“公安包”的皮草包挂在二八型自行车上,包里放着装有午餐的铝饭盒。

“厂里有食堂,当时我每月挣38元6角1分,在食堂吃饭要八九元,太贵了。两个馒头要4两细粮粮票,当时每个人1个月细粮分配仅几公斤,根本舍不得,况且食堂菜品也少,炒菜更是看不见,因此,绝大多数工人都是带饭。”张景振说。

大饭盒里装米饭,有时是高粱米、窝窝头,有时装着一盒生米,到工厂加水后用大蒸气锅煮熟。小饭盒里装菜,多是土豆、茄子配上一小勺自家制的大酱。条件好的,带些炒菜,比如炒土豆丝、炒白菜。谁要是带上了一个咸鸭蛋那可是非常好的伙食了,鱼、肉都少见,因为炒菜蒸后不好吃,带炒菜的就要放在蒸炉、暖气上,叫做“溜饭盒”,用暖气的余热将饭盒加热。条件差的,就只带一大盒饭,饭里埋着两块臭豆腐,当时臭豆腐1分一块,一吃吃上几个月,把班组里的其他工人熏得远远的。

张景振所在的铆焊工段共有120人,一个班组20多人。每个班组都有两个人专门负责将饭盒送

到茶炉房热饭。中午12点开饭,11点半,两人就将班组里所有成员的饭盒收集到一起,送到茶炉房,在长3米、高2米的两个圆筒形状的大蒸气锅里蒸饭。每个饭盒上歪歪扭扭地刻着名字,防止与他人弄混。半小时后,掀开圆形盖子,热腾腾的蒸气冒出来,混着米饭、土豆的气味儿,一顿午餐就好了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蒸汽锅的样式也有了变化。每次摆放饭盒要花时间,工人们想出法子,将锅筒底下安装上轨道,另将铁架焊在一侧固定,每次推开锅筒,将装满饭盒的铁篮子摆上架子,再将锅筒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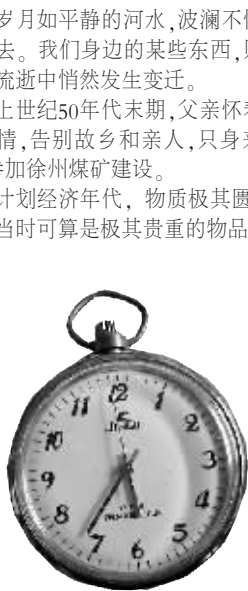
张景振 摄

回,罩上铁架子。这样盖紧盖子,就可以蒸饭了。当时工厂8000余人,共有20多个车间,那些班组离蒸锅远,就自己想法子,将蒸气管道接到铁箱子里,再将饭盒放进去热饭。

“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我和工友们挣到了1500元左右,不再带饭了,开始去厂里的食堂吃饭,还可以单点炒菜了。”张景振滔滔不绝地说。

由于大蒸气锅耗费蒸气太多,上世纪90年代末,各个工厂开始不再使用。2005年,厂里改革,工人午餐免费,每天5元标准,两菜一汤。2010年,食堂增加菜品,每天一荤一素一汤,菜品定量,米饭、花卷、馒头随便吃。“那个带饭盒热饭的年代再也没有了。”张景振感慨。

30年间,工人的午餐发生了巨大变化,而那段热气腾腾的记忆会一直留存在老一辈人的脑海里。



这台老机器曾经很威风

本报记者 张奎

本报通讯员 王莉 刘鹏飞

12月的寒时节节,走进内蒙古一机集团传动厂房,一台造型奇特的机床吸引了记者的视线,它头顶有一个长长的“烟囱”,立在一片低矮的车床中间,特别显眼。

操作工鲁强告诉我们,“这是一台Y58插齿机,已经属于工厂‘元老级’的设备了。”与周围的其他机床相比,它的“颜值”实在有点低:机床表面的漆皮经过常年油液的侵蚀,已经掉了许多;“烟囱”上日常清理不到的地方,布满了灰土,只有插齿刀划过零件表面时响起的那一声声厚重的金属摩擦声,提醒着人们它还处于工作状态。

这台老机器也曾有过威风的光彩。那是上世纪50年代建厂初期,作为新中国“一五”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坦克厂拔地而起,一批批崭新的设备安装到了生产线上,插齿机就是那时必不可少的重点设备。“新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辆主战坦克就有它的功劳。”鲁强自豪地说。

鲁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参加工作,一直从事齿轮加工工作至今,对这台设备爱护有加。计算齿数、换传动挂轮、调整刀杆高度、手动拧紧刀头……这一步步操作顺序,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他脑子里。

进入上世纪90年代,随着产品类型的增多,Y58机床加工产品单一,生产效率跟产能要求逐渐出现差距。随着数控化设备不断的引入,生产已经从老式设备耗时间、费人力的加工模式向高效精准、“一人多机”的模式转变。

就在这台“元老级”的设备不远处,



王莉 刘鹏飞 摄

像浇花一样,朝着大喇叭接地线的土中浇一桶水,声音很快就洪亮起来

小喇叭开始广播啦

高志刚

“就在这一片儿,没错,岗上就属这片地势最高!”12月22日,河南油田采油一厂双河联合站老工人朱广荣手指罐区,十分笃定:“从前树着一根高大的杉木杆,顶端捆着两个大喇叭,电线翻山越岭,电流嗡嗡直叫,愣是一节节接进油区来。广播站的播音员说话前,习惯先用手拍打两下话筒试音。梆!梆!像从喇叭里敲打出来一样,周围麻雀全被吓得四散逃窜。只要有这种动静,就意味着小喇叭要开始广播啦!”

记忆如河,一旦开闸,朱广荣整个人变得神采飞扬。重拾河床上的贝壳,恍惚间也重回到了30年前。风华正茂的他,和年轻工友们围坐在杉木杆下,一边吃着晌午饭,一边听刘兰芳的评书《岳飞传》,不知道吃饱吃好没,反正听得津津有味。

山沟里的石油工人,几乎与世隔绝,赶不上农村,更比不得城市。一根杉木杆,两个大喇叭,承载着所有人对山外事物的好奇。广播站的作用也越来越广泛,开大会、发通知、传达工作精神、弘扬企业文化、油田领导甚至还专门聘请行业专家播音讲课,将学习作用发挥到极致。

那个时候,因为技术的匮乏,联合站各个班组在实际工作中走了太多弯路,所以每逢广播授课,不管是泵修工、锅炉工、集输工,还是电焊工、化验工、管钳工,全都拢在一起,把杉木杆堵得水泄不通,一个个竖起耳朵听,手捧小本本记下专家老师讲的每一个字。

有时候,职工聚集得太多,现场无比喧闹,那些听不清大喇叭声音的职工们,慢慢琢磨出了一个窍门:像浇花一样,朝着大喇叭接地线的土中浇一桶水,声音很快就洪亮起来。

上世纪90年代,传呼机与手机横空出世,接踵而来的还有电脑网络的普及,喇叭渐渐退出舞台,原油罐区扩建也令杉木杆不复存在。

2014年秋,在老工人闫玉彪退休的欢送会上,他临走的一句话,令朱广荣也不禁眼圈通红:“真想再听听喇叭的广播声啊,哪怕是听杉木杆上电线的嗡嗡叫声,该有多好啊!”

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。双河联合站站长周平顿时来了精神。他本人在调音上有专长,而且作为一站之长,也一直想为联合站的“家文化”寻找一个合适的载体。

经常4个月的筹备,2015年春,广播站开播。周平专门邀请闫玉彪及站上这些年退休的老石油们“回家看看”。当天,周月江清唱的一首老歌《兰花草》,让昔日的工友们感慨万千。

截至12月20日,在短短10个月里,双河联合站凭借广播站纠正不良工作操作习惯45例,技术理论授课286个学时,传上级文件精神220份,为职工送上生日祝福52人次,点播485首。